

人世间

母亲的天空

林纾英

灾难来临是那么猝不及防。当孩子在当地三甲医院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时候,我终于在第七天的早上,带着甜甜上了去北京的飞机。

四个小时后,我与甜甜出现在北京天坛医院,挂号、排队、脑电图、心电图、磁共振,一个个检查项目,一切指标显示都正常,可是,甜甜的痛苦却每时每刻都在加重。接着,宣武、同仁、协和,各个大医院挨个看过去,甚至不惜花近千元从号贩子手中购买各大医院的专家号。然而,十几天过去了,甜甜的病仍然没有确诊。

每天夜里,孩子的头疼都会比白天厉害。甜甜是个坚强的孩子,但难以忍受的头痛仍使她夜夜哭号。每当病情发作时,我在给她服下散利痛后,就在床上抱住她。看着怀里痛苦挣扎、日日消瘦下去的孩子,我的心如刀绞。在朝阳区一间十四楼的客房里,一天夜里,听着孩子一声声的哀号,我的心如被一把锋利的刀片一次次无情地切割。我再也坚持不下去,我放下了怀抱中的孩子,走到了窗前。窗外,是京城繁华的灯火,内心突然间沉静了下来,死的欲望在那一刻强烈地袭来,我慢慢地拉开酒店沉重的双层玻璃窗。忽然,背后传来甜甜微弱的声音:“妈妈!”

这一声呼唤是那么微弱纤细,却似一道有力的绳索,把我的心重新拉回到她身边。孩子伸着她细瘦的小手,向着我的方向抬了抬,无力地再唤了一声:“妈妈!”

“甜甜,妈妈在!”我扑向床前,握住了孩子无力的手,抱住了她的头,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头上,一时间泪奔涌而出。疼痛使甜甜睁不开眼睛,她努力地抬起小手,摸着我的脸,“妈妈别哭!”她紧皱着眉头,头疼正在剧烈发作中。

几近绝望时,我想起了丈夫。他也许不是好丈夫,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父亲,他爱甜甜,视为掌上明珠。面对着痛苦不堪的孩子,我的心被撕裂了,我拿起了电话向他求助。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一个小时后联系到了301医院的专家。

第二天,孩子的病在301被确诊。此时,距发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,因为拖得时间太长,孩子左眼视盘上下及鼻侧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神经上皮层脱离,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病。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,于当天抵京,他哭着向我忏悔,感谢我救了女儿,然后紧紧抱住泣不成声的我。

为了照顾孩子方便,我们搬到了五棵松医院附近住下。九天后,因为一个重要案件,丈夫被单位召回。此后十几天,孩子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。母亲每天都有电话来,询问甜甜病情,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照顾好孩子,照顾好自己。

心力交瘁的我病倒了,头一直昏涨,浑身酸痛无力,口中干苦,什么东西也吃不下。为了能有足够的精力与

体力照顾孩子,我对宾馆餐厅说,每天为我炖一只人参乌鸡,还有海参,直到吃到鼻子出血。我以这种生硬而野蛮的进补方式,使自己在北京坚持了下来。

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,几次要来帮我,被我坚决拒绝了。我曾告诉过母亲孩子所在医院,她记不住,又问我,并再三说她要自己过来。母亲身体不好,还要照顾我年幼的侄女,还有,父亲不会做饭,妈妈要服侍他们的一日三餐。她若过来,爸爸与孩子恐怕连饭都吃不上。北京夏日干燥酷热,我还怕她身体扛不住。为了阻止母亲进京,我拒绝再接她的电话。

一天夜里十点,服侍孩子睡下。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出医院大门的时候,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:“英儿!”

我怀疑是听力出了问题,我不相信妈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京城。母亲天生没有方向感,除了村子方圆十余里的地界,她这一生,几乎就没出过远门,她怎么可能来到我的身边?我茫然地抬头看着远处,看到的是夜里仍川流不息的京城人,没看到母亲那矮矮胖胖的身影,于是就格外哀伤地低头向宾馆处走去。

“英儿!”

我再一次听到这样的呼唤。这一次我不再怀疑,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母亲的声音,这声音就在我的眼前。我也真真切切地看到了,矮胖的母亲就站在我的面前。

她拉住了我的手。当母亲突然站在我的面前,我几乎站立不住,踉跄了一下,跌在了她的怀里。

抱着怀里的我,母亲凄惶地喊着我的名字,当着来来往往的众人呜呜地哭出了声。“乖呀,甜甜的病把你累垮了,看你瘦得不成人形了。”母亲哭着,一手揽住我,一手把我的胳膊举到我的眼前。我的胳膊已经瘦得脱了形,皮包骨头,青筋暴露。

“妈,没办法,甜甜她是我的命!”我突然感到那么委屈,泪水决堤而出。我绷紧了的神经与身子,在见到母亲那一刻突然间松懈下来,晕倒在她的怀里。

醒来时,我躺在了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,母亲守候在我的身边。她握着我的手,就如我此前一直守候着我的女儿一样,用与我疼惜女儿一样的眼神怜爱地看着我。她的眼里,满是泪水。

母亲贴我很近,我感受到她呼在我脸上的气息甜润而沉静,她的眼里满是怜爱与慈祥。她慢慢地将手从我的脖颈处绕到我背后,轻拍着,另一只手轻缓地捋着我的眼眉——像小时候一样。我闭上眼睛再一次睡去。

再次醒来,天已放亮。我记起了头天的情景,恍如置身梦中。看到趴在脚边睡着了了的母亲,我终于确定那不是个梦。母亲,她孤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。

在沉思中,我记起了一个久远的场景。那是我七岁多时一个冬天的夜里,五岁的妹妹突然发起了高烧。夜里雪下得很大,一向胆小夜间不敢独自外出的妈妈,那一刻毫不犹豫地用两床棉被裹起妹妹,推着独轮车走上了去十几里外镇医院的山路。去镇里要翻越两座山,要走的路也是崎岖小路,还要途经好多采石场,那些采石场向下挖去几丈深,稍有不慎,跌下去轻则重伤重则会丧命。

雪没过了脚踝,天地一片苍白,没有月光,分辨不清哪里是路,哪里是沟壑,只能一步步地探索着向前走。在翻一座山时,母亲滑倒了,妹妹滚下了山坡。等找到妹妹时,她什么知觉也没有了,感觉不到呼吸。母亲以为妹妹死了,就丢掉车子,抱起她,在呼啸的风雪中,一路哭喊着奔向医院。医生说,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,妹妹就没救了。

望着母亲散垂在床上那丝丝缕缕的白发,我记起了她映在一盏棕褐色煤油灯下那一头的黝黑乌亮。那个时候,她似乎每晚都有做不完的针线活,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,一针一线缝制着我们一家人的一年四季……

孩子住院期间,为了给她补充因为大量使用激素而造成的维生素流失,我每天要给她买很多的水果。对那些水果,我偶尔也会尝一点,但母亲从来舍不得吃一口。

母亲,她一直是这样。自我记事起,家里有好的饭菜她都是先给在外操持的父亲,然后是她的孩子们。她一生都在为家人辛勤操劳、无私地付出着。正是有了母亲的精心操持,我们一家人吃得开心、穿得体的面,其乐融融。

自从母亲来到北京,我就不再早起。每天早晨她给我买好早餐,再将两只海参洗干净,用开水泡着,放到我枕边的床头柜上。连我每顿需要服用的药物,她都给我准备好放在床头。当我还在梦中的时候,她已早早地去了医院。

母亲的到来,卸去了我大半的负担,我的身体也慢慢地恢复起来。孩子每天守着姥姥很开心,身体在轻松快乐的日子中渐渐康复起来。母亲用她已不再强健丰满的羽翼,为我撑起一把伞,为我与孩子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。

由于治疗得当,一个多月后,孩子的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,治疗暂告一段落。办理完出院手续,我与母亲牵着甜甜的手,谈笑风生地行走在北京舒爽的秋天里。有一刻,孩子抬头很认真地看着慈祥的姥姥,问:“姥姥,你把姥爷和月涵丢在家里,你不疼他们吗?”

“乖,姥姥很疼他们,可是姥姥把你和妈妈丢在北京会更疼啊!”母亲对甜甜说完这句话后,把头转向了一边。在那一瞬间,我看见母亲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动。

又见榆钱落 又见槐花开

金海霞

妈妈享年94岁,按民间的说法94岁属于喜丧了。可是至亲离世,无论多长寿也会不舍和难过。妈妈走后好长一段时间,路过街边的小吃店,会习惯性地想起妈妈爱吃店中的某种食品,正要抬脚进店去买,忽然想起妈妈已经不在了。在厨房做好饭菜,习惯性地转身去妈妈的卧室,刚要说吃饭了,看着空荡荡的卧室,泪水就打湿了眼眶。

妈妈发病的头一天很反常,一向沉默寡言的她,和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。晚饭后,她笑呵呵地告诉我们她要走了要回老家。发病的那天早上,她还吃了几个馄饨,中午没吃几口就回卧室午休了。午饭后,我在客厅听见妈妈好像在呕吐,去卧室一看,妈妈闭眼躺着,昏迷了,叫不醒。

妈妈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了三天两晚,一直昏迷不醒。我和二哥一直守在监护室外。

那晚,我和二哥快半夜的时候去医院外散步。路过一处街边花园,空气中隐隐传来花香,抬头发现几棵开满白花的刺槐树。越过树梢向夜空看去,只见黑色的夜空中有三只白色的大鸟,像极了仙鹤,一只在前,两只在后,呈人字队形,由西面向着医院的方向,缓缓飞去。第二天午后,妈妈驾鹤西去。

妈妈离世,走的时候没怎么遭罪,我觉得是她积德行善的缘故。1960年大饥荒的时候,妈妈在牟平城关小学教学。一天中午放学后,她发现一个孩子趴在课桌上一动不动。妈妈问那个孩子怎么不回家吃饭,孩子可怜巴巴地说:回家也没有饭吃,好几天都没吃饱饭了。妈妈回家做了一盆汤面,端回学校,让那个孩子带路,送到了他家。妈妈当年的那一盆汤面,让那个孩子的一家人感激不尽。

对我来说,妈妈的安然离世,除了不舍和难过,突然间还有一种释然的感觉。20年前,我的小哥英年早逝,让当时70多岁的父母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。小哥的早逝在我心里留下了很重的阴影。我在生孩子之后身体变得非常不好,常常担心自己会像小哥一样,走在父母前头。10年前送走了84岁的父亲,去年又送走了94岁的母亲,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我想,一介平民百姓,人生最重要的事无非就是给生我的父母养老送终,助我生的人成家立业。

榆钱落了,槐花又开,妈妈驾鹤西去整整一年了。春来枝头抽新绿,夜寒卧衾梦回昨。慈母候儿门前坐,见儿执手笑问多。这一年有时会梦见妈妈,但是次数不多,梦境也很平和。这一年,心里有难过和伤感,但也是淡淡的,父母晚年我一直和他们身边陪伴照顾,尽心尽力,心中也就没有什么遗憾,也就没有特别的悲伤。人生自古谁无死,妈妈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,去往了天堂。